

華東政法大學

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

“自己人”还是“外人”？
题目： 独生子女的同辈亲属交往类
型研究

院（系）： 社会发展学院

专 业： 社会学

班 级： 18030 班

学 号： 18112701028

姓 名： 易昕瑶

指导教师： 徐寒羽

“自己人”还是“外人”？独生子女的同辈亲属交往类型研究

摘要： 在以往有关亲属关系的研究中，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群体鲜少被单独研究。而作为中国年轻一代的主要人口，探讨他们的亲属网络和亲属交往对把握中国整体亲属关系和制度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以对他们未来可能在亲属关系缺失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提前预测与探讨。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对 10 位独生子女与他们同辈亲属交往的状况、类型与功能、维持意愿展开研究。结果得到，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保持着一定的密切性；多数独生子女认为同辈亲属处于人际圈中的“自己人”地位，与他们的交往具有高义务性与真理性；超过半数的独生子女愿意日后主动与他们的同辈亲属维持交往。但这种交往的密切性与维持意愿随着年龄段的降低呈现衰减的趋势，90-00 段的独生子女在面对同辈亲属交往时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处境，他们年迈后可能出现的来自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的缺失也同样值得关注。

关键词： 独生子女；亲属关系；亲属交往类型；家庭

“Intimate Family Members” or “Outsiders”?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Types Among the “Only-child” and their Peer-relatives

Abstract: In previous studies on ties of kinship, the special group of the “only-child” has rarely been studied. As they are becoming the major population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China, it is of much importance to explore their kinship network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relatives so that we can grasp the changes in ties of kinship in China as a whole. At the same time, this can also predict and explore in advance some problems that may occur in their aging life due to the absence of kinship.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raction conditions, interaction types and functions, and the willingness to maintain interaction between “only-child” and their peer-relative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nly-child” group remain a certain degree of closeness with their peer-relatives, and most of them consider their peer-relatives as "intimate family members (Zijiren)" in the interpersonal circle, with high obligation and high authenticity, and are willing to maintain interactions with them actively in the future. However, this closeness and willingness to maintain interactions tend to decline as the age group grows younger, and “only-child” in the 90-00 age group are facing a "paradoxical" situation when dealing with their kinship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only child; kinship; relative interaction; family

目 录

1、引言	1
2、文献综述	1
2.1 现代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研究	1
2.2 独生子女亲属关系及“同辈亲属”群体的选择	2
2.3 研究问题	4
2.4 分析框架	4
3、研究方法	5
3.1 深度访谈	5
3.2 研究工具	5
3.3 访谈对象	6
3.4 资料分析方式	7
4、资料分析结果	7
4.1 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状况	7
4.1.1 空间距离	7
4.1.2 互动频率及内容	8
4.1.3 亲密程度	9
4.1.4 互助意向	10
4.2 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类型与功能	12
4.2.1 亲属交往类型	12
4.2.2 亲属交往功能	15
4.3 社会变迁下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维持交往的意愿	16
4.3.1 独生子女与父母辈同辈亲属交往的比较	16
4.3.2 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维持交往的意愿	18
5、总结与讨论	22
参考文献	25
致 谢	26

1 引言

家庭和亲属在个人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是人类学、社会学一直以来的重要议题。关系亲密的亲属往往处于个体“差序格局”圈子中最靠近中心的部分，与个体存在着紧密的社会连结，给予个体作为家庭的社会支持系统。而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进展改变了传统的亲属关系格局，使人们的家庭结构和亲属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外学者对西方社会家庭制度的转变提出假说，认为家庭结构从“扩大的亲属群体”向“孤立的核心家庭”转变（帕森斯，1943），并认为广阔的亲属集团如氏族、家族正在逐渐消失（古迪，1996）。国内的学者借用“核心家庭”这一分析概念，对工业化进程以来中国社会亲属关系的变化也展开了诸多讨论。目前有关亲属关系的最新进展所达成的共识是：亲属关系既有被现代化进程改变的部分，同时国人独特的亲属文化与观念使得关系中的部分“恒常”得以保留，个体可以在此中选择性地安排自己的亲属关系，自主又密切的亲属关系是传统和现代高度“契合”的体现（沈奕斐，2010；唐灿、陈午晴，2012；杨善华，2021）。

这类研究多于近十年前保持活跃，而随着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独生子女人口数量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改变过去国人的亲属网络的结构。独生子女家庭从纵向分布上看形成“四二一”格局（陆学艺，1995），横向上看独生子女缺少亲兄弟姐妹，同辈亲属只有堂（或表）兄弟姐妹。对于这个群体亲属关系的专门研究在过去的文献中鲜有提及。然而，独生子女群体的出现以及他们特殊的家庭和亲属网络结构是研究中国人亲属关系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探索他们的亲属关系具有比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独生子女群体自身，横向亲属网络的缩减意味着他们所能得到的来自于家庭的社会支持系统的衰弱，这可能会对他们未来年迈时的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提前探索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

2.1 现代中国社会的亲属关系研究

有关我国亲属关系的大型调查研究和学术讨论主要活跃于上世纪末至近十年前。这段时间内，由于我国现代化潮流的迅速演进，人口流动性上升，城市社区开放程度提高，致使传统的亲属关系发生了质上的改变。学者们普遍指出，“核心家庭”在各种类型的家庭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正在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家庭结构（王跃生，2006）。与此同时，个体家庭在家族和亲属体制中获得了自主性，脱离后者开展相对独立的社会交往与经济活动，并与后者保持这一种“疏而不离”的互动关系（徐安琪，1995）。个体确定亲属关系“差序格局”的基本原则发生了改变，不再以简单的血缘和姻亲关

系进行排序，而是根据亲密程度、互惠性支持与救助来确定关系的远近，增加了更多自主选择成分（杨善华、侯红蕊，1999；沈奕斐，2010）。

对于当代城市居民的亲属关系，唐灿、陈午晴（2012）通过“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发现，亲属关系不像经典现代化理论所说的那样趋于“消失”，而是在互动、互助行为上都相当活跃，亲密程度也较高；而同时，在这种活跃的互动往来之中，个体或个体家庭也保持着自主性。即，个体家庭与扩大的亲属网络并存，个体的自主性与亲密的亲属关系并存，传统亲属制度与城市现代生活方式并存。沈奕斐（2010）对于上海 46 个“个体家庭”的研究也印证了前述结论。她指出年轻一代的个体开始摆脱提携亲属的义务，也就是个体的自主性得到提升。但同时，亲属关系对个体而言依然是重要的，只不过它不再具备以往的强制性，而是成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体系”。个体可以根据利益、亲密关系来决定和哪位亲属来往，和哪位不来往。以上两个最新的有关城市亲属关系的研究都指出，城市居民的亲属关系在现代与传统的博弈中保持着“和谐”的局面，个体没有完全游离于亲属网络之外，而是在一个松散的网络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自主性，取得自己的所需。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一步变化，一个新生的、特殊的群体出现了——独生子女。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年轻一代的独生子女个体被迫面临着没有亲生兄弟姐妹的局面。这使得他们的亲代（父母）在他们身上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同时，他们缺少同龄的近亲群体的陪伴，即，他们的同辈亲属都是堂（或表）兄弟姐妹了。这样的局面会不会导致独生子女的亲属关系发生变化？独生子女与亲属群体的互动仍在传统与现代中保持着平衡吗？目前这一问题鲜少得到关注。然而，对于探索我国新一代人群的亲属关系来说，研究独生子女的亲属网络结构是必不可少的。

2.2 独生子女亲属关系及“同辈亲属”群体的选择

对于亲属关系研究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由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独生子女”成为了新生代的人口主力军。自 1980 年前后该政策实施，至 2016 年放开“二胎”，期间，一对夫妻被鼓励仅生育一个子女，也就是说，独生子女没有亲生的兄弟姐妹。对于这一特殊的群体，亲属关系在他们身上无疑发生了变化，即横向亲属群体缩减了。一个独生子女如果未婚，其横向亲属群体只有堂亲或表亲。

有专门注意到独生子女亲属关系的学者认为，随着他们父母一辈（包括父母和父母的兄弟姐妹）的老去或者去世，独生子女今后的亲属网络就只剩下那些堂表兄弟姐妹了。在这种局面下，他们与他们的堂表亲是很少会互动往来的，这就意味着届时他们的亲属网络规模会急剧缩小（风笑天，2020）。不与堂表亲高频互动的独生子女可能会寻找别的社会关系来替代亲属关系，以弥补自身的心理需求与情感需求，因此也会给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结构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改变。

事实是否真的如他预测的那般呢？目前有关独生子女亲属关系的实证研究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原因在于学界整体关于亲属关系研究的减少，以及对于独生子女群体采取实证研究存在着困难。亲属关系或者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主要流行于十年前，而自 2011 年以来，就很少有开展专门针对“亲属关系”的研究了。那时，年龄最大的一批独生子女也就 30 岁左右，可能刚刚成家立业，而大部分独生子女还未成年，这意味着他们的社会关系尚未稳定，仍处于发展甚至萌芽阶段，因此对他们展开探讨也就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鲜少的文献中看到学者对于独生子女亲属关系的预测。比如，沈奕斐（2010）在“单边式亲属关系”的探讨中，通过对独生子女父母的访谈，推测独生子女亲属关系的范围会变得非常狭小，与同辈亲属很难建立亲密的情感关系，甚至与现在的玩伴的亲密关系会超越同辈亲属关系。王跃生（2013）在“中国家庭未来走向”中提到独生子女政策对夫妇、亲子关系具有强化作用；在对于“亲属圈家庭”的分析中提及，该类家庭在部分两代以上均为独生子女的家庭中趋于消失（王跃生，2010）。

而在第一代独生子女又成长了十年后的当下，他们已经建立起了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因此研究他们的亲属关系就变得可行和有意义了。我们想要知道的是，独生子女与自己的亲属的交往状况如何？亲密程度如何？他们怎样界定自己与亲属关系的类型？以及，他们是否愿意继续维持与亲属的互动往来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呢？我想，对于这些问题，在第一代独生子女尚未步入“孤立无援”的亲属网络局面之前，提前开展研究、对此领域进行探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对于独生子女亲属群体研究对象的选择，本文集中研究他们与“同辈亲属”之间的关系。独生子女的“同辈亲属”所指代的群体相当于英语中的“cousin”，也就是所有非亲兄弟姐妹以外的同辈亲属，包括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哥、表弟、表姐、表妹。正如风笑天（2020）所述，在独生子女父母辈亲属尚在世时，独生子女仍与这些亲属有所往来，受他们的照顾，家庭或家族尚可以给他们提供情感或社会资源支持。但当父母辈亲属都不在世了，剩下的亲属网络，除了他们的下辈（子女、孙辈）之外，就只有那些出自非同父母的同辈亲属，即堂（或表）兄弟姐妹了。这些堂表亲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独生子女能否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社会支持网络。如果独生子女与他们不再联络，那么支持网络自然会有所减少，且这种减少意味着，独生子女几乎不再能从自己的长辈和同辈亲属那里得到任何支持了。因此，研究独生子女与其同辈亲属的关系，及何种因素促成他们的关系维系意愿，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届时独生子女是否还能具备这样的支持网络。

此外，由于独生子女的“同辈亲属”直指“旁系同辈亲属”（即堂表亲），因此，对这种“旁系亲属”关系的研究还可以起到探索“族”、“属”在当下社会的存在地位。过去，父权家庭制度体系下，“家”不仅包含了“家庭”，也包含了“家族”，家庭成员负有对自己家庭所属家族的责任和义务（杨善华，2011）。而在现代，核心家庭数量和地位的显著上升意味着子女分家，各自成立小家庭，不再

依附于原来的“大家庭”、“大家族”之下。原本庞大的亲属网络随之缩减，尤其是作为横向的亲属网络缩减了。在这种情境下，对于原本拥有悠久亲属关系传统与家族义务的中国人而言，他们与旁系亲属的关系变得怎么样了呢？是较快疏远了，还是仍保持着一定的互动频率和亲密性？我想，研究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之间的关系，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一定的阐释。

2.3 研究问题

以往有关亲属关系的研究未专门涉及对独生子女亲属关系的探讨，而作为年龄不断增长的独生子女群体，势必有一天会面临父母辈亲属去世、只能与旁系同辈亲属交往的局面。对此，提前研究他们与（旁系）同辈亲属的关系相当重要，可以为日后作为家庭和亲属网络的社会支持系统大幅衰减后、独生子女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和精神问题提供更好的应对措施。同时，作为年轻一代，独生子女与（旁系）同辈亲属的交往状况、交往类型也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走向，对此进行探讨具有预测性的效用。

“亲属关系研究”通常是一个比较庞大的话题，涉及“亲属关系”的方方面面。以往研究在谈论“关系”时，大多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使用一些客观的维度指标（如“居住安排与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互助意愿”等）对人们与亲属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做出界定。本文在谈论“亲属关系”这一问题时，并不试图涵盖其所有层面，而是试图站在独生子女个体的主观立场上，询问他们自身对于与亲属交往的看法，包括认为与亲属的关系属于何种人际关系类型、日后是否愿意继续保持与亲属的交往等等。

本文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展开。一，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状况；二，与同辈亲属交往的类型与功能；三，社会变迁下与同辈亲属维持交往的意愿。

2.4 分析框架

以往关于亲属关系的分析框架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也没有在亲属关系类型的划分上找到最优的分类模型。在“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¹这一全国大型调查中，采用了四个维度来衡量亲属关系，分别是：空间距离、互动频度、亲密程度和互助倾向（唐灿、陈午晴，2012）。这四个维度发源于施瓦斯坦和本特森（Silverstein and Bengtson, 1997）用以研究代际团结的三元维度，分别是：亲和性（亲近和认同）、机会结构（居住安排和日常联系）、功能性交换（互帮互助的工具性支持）。在中国有关代际关系类型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多借鉴这一模型，将其转化为三个大的关系维度

¹ 该调查为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由李银河负责主导，实施时间为2008年。通过对5个城市进行入户调查，研究中国城市亲属关系的情况。

进行分析，即居住的远近或联系的强弱、情感的亲疏、相互支持的多寡（曾旭晖、李奕丰，2020）。

“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也按照这三个大维度开展研究，区别是将居住距离和联系（或互动）强弱分开计算，如此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亲属关系的脉络。本文对独生子女同辈亲属交往状况的研究框架也将采用上述调查中的四个维度，即空间距离、互动频率、亲密程度和互助意愿，不过在互动频率上增加了互动内容，以求更完整地展现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状况。

由代际团结三元维度所划分出的理想的关系类型存在 8 种，在研究的实际应用上存在困难。因此，本文采用杨中芳（1999）的人际关系四种类型作为“交往类型”的分析框架。杨中芳在黄光国的人际关系理论上，将其“情感性关系”中的“情感”成分划分出“应有之情”和“真有之情”两个维度，并根据两个维度的高低生成四种人际关系类型（沈毅，2006）（见图 1）。“应有之情”是义务的、规范的情感，与“礼”相对应；“真有之情”是内心真正的、自发的，与“情”相对应。由此分出高应有、高真有的“自己人”，其中常见的是家人（父母、子女）、结拜兄弟/姐妹等；高应有、低真有的“身份性自己人”，其中常见的是远房亲戚；低应有、高真有的“交往性自己人”，其中常见的是朋友；低应有、低真有的“外人”，对应的是陌生人。这一模型可以很好地测量独生子女认为他们的同辈亲属更接近于哪类人，继而不仅预测同辈亲属未来会在哪方面给予独生子女社会支持，而且反映旁系同辈亲属在年轻一代中国人的认知中处于何种角色地位。

情感 义务	高真有	低真有
高应有	自己人（亲情、铁哥们）	身份性“自己人” （人情或恩情）
低应有	交往性“自己人” （友情）	外人

图 1 情感性与义务性的四种人际关系类型（杨中芳，1999）

3 研究方法

3.1 深度访谈

本研究旨在描绘出独生子女与其同辈亲属交往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他们之间的交往类型和交往的功能，然后对亲属关系变迁下独生子女会采取何种关系维持方式进行探索和预测。访谈是质性研究中最重要资料收集方式，研究者可以借此了解被访人过去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对经历的论

释。在深度访谈中，研究者可以使用追问、倾听等方式，使被访者更全面、深入地建构他们过去的经历，研究者也可以从中发现与原先预设不同的新现象或新切入角度等等。

在本研究的访谈中，被访者将他们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状况、亲密程度、他们所认为的关系形态，以及他们试图在未来建构彼此关系的方式等方面告诉研究者，使研究者逐渐建立起有关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关系的完整、透彻的图谱。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状况，第二部分是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类型与功能，第三部分是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维持意愿分析。

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过程依大纲进行，同时鼓励被访者说出自己的想法，且根据访谈情况、程序和内容做出灵活调整。访谈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在被访人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每次访谈约持续半小时至一小时。在第一部分中，为了使被访者的日常口头表达更加具象化，采用数字计分的方式，分别对被访人与同辈亲属的空间距离、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互助意愿进行 1-5（1 代表最远、最低，5 代表最近、最高）的 5 点式评分，并对互动方式和内容进行补充。数字打分的目的在于使描述变得更加精确。比如，对于“互动频率”这一维度，被访人在日常表达中可能会直接回答“一般”，但“一般”到底是“多久一次”，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它可能指的是“每周一次”，也可能是“每月一至二次”。又比如，对于“亲密程度”，被访人可能会回答“挺亲密的”，但这个“挺亲密的”到底是更接近 5 分制中的“4 分”，还是“5 分”，也不明确。而如果使用数字预先划分好衡量尺度，并进行计分，则可以使得对这些维度的描述更加精准。此外，在被访人对 4 个维度进行数字打分之余，研究者也鼓励他们提供打分依据，或对这些交往状况做出进一步的阐释说明。在第二部分中，研究者向被访人解释四种关系类型，然后让被访人自己做出判断，同时，询问他们如此判定的原因。然后询问他们与同辈亲属的交往在生活中的作用。在第三部分，研究者向被访人询问父母辈/长辈的同辈亲属交往状况，并让他们比较父母辈/长辈与自身的区别。然后，研究者询问被访人日后会如何处理与同辈亲属之间的交往状况。

3.3 访谈对象

邀请我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后（时间约 1980 年后）的独生子女作为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共计 10 人，如表 1 所示。其中男女对半，即男性 5 人，女性 5 人。

从年龄分布上来看，访谈对象主要集中在两个年龄段，分别是 85-90（含）段、95-00（含）段，其中“85-90 段”有 4 人，“95-00 段”有 6 人。访谈对象的平均年龄为 27 岁。

从户籍分布上来看，多数访谈对象自身的户籍为“城镇”，只有 1 人为“农村”。此外，由于在 10 位被访人中，除了 3 号和 10 号外，其余 8 人的习惯性居住地都位于上海，所以笔者特意询问了他们是位于上海的市中心还是郊区（上海外环及外环外区域），结果得到，有 4 位被访人长期生活在上海郊区，因此笔者将他们备注为“城镇（郊区）”。考虑到父母户籍也可能成为独生子女同辈亲属交往的影响因素，因此笔者也调查了被访人父母的户籍，一并记录在表 1 中。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人口学特征

	ZQ	Eric	YN	Luo	Lx	CY	Yinky	Pei	Dan	Wen
性别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女	女	女
出生年份	1998	1998	1998	1990	1987	1999	1988	2000	1990	2000
年龄	24	24	24	32	35	23	34	22	32	22
户口	城镇 (郊区)	城镇	农村	城镇	城镇	城镇	城镇 (郊区)	城镇 (郊区)	城镇 (郊区)	城镇
父母户口	城镇 (郊区)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转 城镇	城镇	农村	城镇 (郊区)	城镇 (郊区)	城镇

3.4 资料分析方式

资料整理阶段，将访谈录音转化成逐字稿，再根据访谈时的笔记，对不清楚之处进行补足或修正。必要时对文字稿中的语句进行适当的改写，在不改变原本意思的前提下，使被访者的表达内容更趋通畅。

资料分析阶段，对访谈内容进行逐级编码，提炼出被访者所提到的核心指征。对不同被访者之间进行比对，归纳出适于本研究的理论模型。

4 资料分析结果

4.1 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状况

如前文所述，本文采用“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唐灿、陈午晴，2012）中衡量亲属关系的 4 个维度——空间距离、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互助倾向来衡量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状况。

4.1.1 空间距离

在“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中，将“空间距离”分为5类，分别是“住在一起”（5）、“住在附近”（4）、“在同一城市”（3）、“在同一省”（2）、“在省外包括国外”（1）。

从数字计分的结果来看，“未成年时”与“现在”的情况存在一定差异：未成年时，他们与同辈亲属通常居住在“同一城市”或是“住在附近”，空间距离的远近程度一般；而成年后，由于“离开家乡到其他城市发展”等原因，与同辈亲属的空间距离就变远了。现在（习惯性居住地）仍与同辈亲属在“同一城市”的有6位，其余4位为“省外”。总体而言，受访人与其同辈亲属的空间距离较为疏远。

同时，深入访谈对统计数据所不能描绘到的地方作了补充。值得注意的是，在10位受访人中，有2位（Dan和Wen）在初中以前有和自己同辈亲属共同居住的经历：Dan和她的表弟小时候一直住在一起，直到初中才分开；Wen和她的表妹在Wen上四年级之前也一直住在一起。还有2位的同辈表亲住在他们的附近（CY和Yinky）：CY和他的表妹住在同一小区，表妹每天会来CY家里吃晚饭；Yinky上大学前和她表姐家的距离就隔了几栋房子，工作后有和她表姐同住的一段经历。

表2 访谈对象与同辈亲属的空间距离

	ZQ	Eric	YN	Luo	Lx	CY	Yinky	Pei	Dan	Wen
未成年时	3	1	3	3	3	4	4	3	4	3
现在	3	1	1	3	1	4	3	3	3	1

4.1.2 互动频率及内容

与“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相同，将“互动频率”分为5类，分别是“几乎每天”（5）、“每周一两次”（4）、“每月一两次”（3）、“每年几次”（2）、“几乎不互动”（1）。

总体而言，访谈对象和同辈亲属的互动频率一般，基本保持在“每月一两次”的频率。

表3 访谈对象与同辈亲属的互动频率

ZQ	Eric	YN	Luo	Lx	CY	Yinky	Pei	Dan	Wen
3	3	3	3	3	5	4	2	4	2

不同于以往传统社会走亲访友式物理上的走动，年轻一代独生子女和他们同辈亲属的互动方式多为微信视频、微信聊天、家族微信群聊天等线上互动方式。只有空间距离上较近的，才会经常采取线下见面（即物理走动）的方式，同时这类对象与同辈亲属间的互动频率也更高（CY、Yinky、

Dan)。

每月 2-3 次吧，主要是微信聊天，她来问我英语作文和题目。有机会的话，会去常州面对面互动。(Eric)

每月一两次，会微信视频，主要是互相看娃。因为我家小孩 8 个月，她（我表妹）家小孩 2 岁了，我们就互相视频，在线撸娃。(Lx)

每年几次吧，主要是在微信上聊，祝表哥新年快乐啥的，还有问他借钱。他上次要矫正牙齿，来问我在哪里矫的，因为我之前也矫过。还有就是他情人节发了朋友圈，我就会在下面评论“情人节快乐”；他秀做的吃的东西，我也会给他点赞。(Pei)

她每天晚上要来我家吃饭的，每晚都要来的，除了周末，因为周末她爸妈就回家做饭了。(CY)

每周一两次的，我们会一起约吃饭，然后聊一些关于小孩子的话题。(Yinky)

在互动内容方面，物理上的互动内容多为：约吃饭、周末去祖辈家里、逢年过节聚会等。线上互动内容多为家长里短（如祖辈身体情况）、生活琐事（如去哪里矫正牙齿），有的被访者会谈及工作上的情况。

不同年龄段的互动内容有所差异，85-90 段的独生子女由于有的已经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甚至养育了子女，因此多会谈及家庭生活，及各自小孩的抚养情况（“育儿”话题在已经养育了子女的被访者中高频率被提及，是他们谈话中的关键性话题）。此外，随着他们父母年龄的增长，他们也会互相谈及双方父母的身体状况。而 95-00 段的独生子女要么刚步入工作，要么仍处于求学阶段，他们与同辈亲属的互动内容多为学业、学校生活、恋爱，以及生活琐事。

4.1.3 亲密程度

与“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相同，将“亲密程度”分为 5 类，分别是“很亲密”（5）、“较亲密”（4）、“一般”（3）、“较疏远”（2）、“很疏远”（1）。

总体而言，访谈对象和同辈亲属的亲密程度较高。

表 4 访谈对象与同辈亲属的亲密程度

ZQ	Eric	YN	Luo	Lx	CY	Yinky	Pei	Dan	Wen
3	4	4	3	5	5	4	4	4	5

这项指标呈现的结果与以往的理论 and 预测有所不同，以往认为独生子女和他们的同辈亲属之间的密切程度会大幅下降，很难建立亲密的亲属关系（沈奕斐，2010；风笑天，2020），但访谈结果却表明，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亲密程度比较高。一些被访人——特别是那些与同辈表亲岁数差距较小、儿时与表亲共同生活经历较多的表示，即便地理疏远导致互动频率下降，与表亲的亲密程度并没有下降。

我和表妹差 3 岁……我 4 年级前是和我表妹住在一起，住在一个家里面的，后面 4 年级之后就分开了，就寒假回老家会碰在一起。其实我也觉得比较奇怪，**就是后面一年只见面一面，但还是觉得很亲密。**我现在寒假回老家也每天晚上和她睡在一起的，就是没有任何不适，可能还会觉得抱着睡的那种（感觉）真好。（Wen）

当然，那些与同辈表亲岁数差距较大、儿时共同生活经历不是特别丰富的独生子女，当与他们与表亲由于某些契机互动变少之后，亲密程度也随之下降了。

他比我大 8 岁……小时候我们一起住在爷爷奶奶家过，也睡在一张床上过，一起玩游戏……后来他去当兵当了三年，期间也不联系，因为部队不允许他们联系嘛，然后他回来的时候变化就比较大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刚上初中，变化也挺大，你知道小孩子在那个时候变化都会比较大，**然后就感觉明显比之前要疏远了。**（Pei）

但总体而言，本研究的访谈对象都呈现出与他们的同辈亲属较高的亲密程度。

4.1.4 互助意向

本研究在“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的基础上，对衡量互助意向的指标稍作调整。在“借钱”、“给钱接济”、“重病求助”的基础上增添了“寻求其他帮助”和“给予其他帮助”，以求更完整地展现亲属互助事件的全貌。

表 5 访谈对象与同辈亲属的互助意向

	ZQ	Eric	YN	Luo	Lx	CY	Yinky	Pei	Dan	Wen
借钱	1	2	2	4	4	2	3	3	1	2

给钱接济	5	4	5	4	4	4	4	4	4	4
寻求其他帮助	1	1	1	4	3	1	3	1	1	2
给予其他帮助	5	4	5	4	4	4	4	4	4	4
重病求助	3	2	5	4	4	5	5	4	4	4

从上表（表5）中可以看出，总体上，独生子女向同辈亲属“借钱”、“寻求其他帮助”的意向不高；而“给钱接济”、“给予其他帮助”的意向比较高。这可以理解为，独生子女更倾向于向他们的同辈亲属提供帮助，而不是寻求帮助。当自己遇到困难或问题时，不少被访人表示，往往会将长辈（尤其是自己的父母）作为第一顺位的求助对象，或者是依靠自己独立解决，不太会寻求同辈亲属的帮助。

不会想去问同辈借钱，要借也是问长辈借，况且她（表妹）比我还小。……如果是帮她的忙的话，如果能帮上我会觉得很开心，证明我“还行”。（CY）

我不太有意向向她（表妹）借钱……让她帮别的忙，也不太有意向，我总觉得表妹不是自己的同龄人，心智不太成熟，看她像看小孩一样（实际上表妹比她小3岁）。……如果是借给她钱的话我愿意，但我想我们首先应该会先找爸妈。（Wen）

意愿上我会把她（表姐）当作一个备选项，但就是口头上和她提一下，最近没钱了或者怎么样，不会真的找她借。我自己也能安排好我的财务，一般不会问别人借钱。……她真要找我的话，我会直接给她，不用还。（YN）

在这里，独生子女不认为对方（同辈亲属）有义务帮助自己，但认为自己有义务帮助对方。可以说，亲属的互助纽带变弱了，但帮助的义务仍然存在。这一方面可以解读为，由于社会环境可以给个体提供更好的解决困难的选择机会，所以个体不再需要向亲属，尤其是向作为旁支的同辈亲属寻求帮助，而是可以自己利用社会资源解决问题，因此原本功能上互助共存的亲属共同体在实然上没有紧密团结的必要了；但另一方面，用以维持原本互助结构的亲属责任和义务的观念却被遗存下来，使个体仍然相信自己应该具备帮助的义务。这也对过去研究中“个体从亲属责任和义务中解脱出来”的观点（沈奕斐，2010）做了补充。在年轻一代的独生子女身上，个体的亲属责任和义务不再是“主动提携家人，一起过上好日子”，而是体现为“在困难的时候帮你一把”的困境帮助义务。

年龄的长幼对互助方向有影响，年长的独生子女更多的是“单向帮助”，他们不会愿意向年龄更小的同辈亲属一方寻求帮助，而是愿意更多地给予后者帮助，而年幼的独生子女更多的是“双向互助”。性别对互助方向没有影响，即哥哥会帮助妹妹，姐姐也会帮助弟弟/妹妹。

年龄段对互助意愿的方向性有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变迁对亲属关系的影响。85-90 段的求助与给予帮助的差距较小，除了 Dan 以外，其他 3 位此年龄段的被访人（Luo、Lx、Yinky）都持有较高的求助意愿和给予帮助意愿（Dan 认为自己与表弟家的经济条件差别较大，自己家明显优于表弟家，加之自己是姐姐，所以应该是自己照顾弟弟），并且有实际求助事例在他们身上发生：“有让他们家帮忙投资理财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做金融的嘛”（Lx）；“有事情的时候，会让她帮忙照看一下孩子”（Yinky）。而 95-00 段的独生子女均是“不愿求助、愿意帮助”的类型，就连“表妹与自己住在同一小区，每天会来吃晚饭”的 CY 也不太愿意向表妹求助。可以反映出亲属互助（经济、其他生活琐事互助）纽带随着时代变化，呈现出弱化的趋势。

在“重病求助”上，独生子女总体的求助意向则与前两项（经济、生活琐事）不同。“重病求助”的总体意向比较高。

会的，妈妈和姐姐关系很好，如果家里出了事情，肯定是要拜托她的。……我自己出面的话，我也会，如果要找人帮忙，肯定是找姐姐。（YN）

会，主要是是经济上的求助，照顾料理方面不大会求助。（Lx）

其中，3 位被访人（Luo、Lx、Pei）特别提到，他们主要会寻求经济上的帮助，照顾料理上则不太会求助于同辈亲属。只有 1 位被访人（Yinky）明确表示主要会寻求人力上的帮助，请表姐帮忙照看（Yinky 认为自己家比表姐家的经济条件要好）。笔者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是亲属义务降低的一种体现。因为金钱借助可以偿还，最后使双方“两清”、各不相欠，重病的金钱借助是解决燃眉之急，但最后总会把这份人情归还的。而人力帮助则很难进行偿还，照顾了就是照顾了，这份人情很难还清。可以说，年轻一代的独生子女不太愿意这样去“麻烦”他们的同辈表亲了。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这种义务的强度有所下降，它毕竟还是存在且相对比较牢固的，在自己的家人发生重病时，独生子女总体的求助意愿仍比较高。

总结来说，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在住所的空间距离上总体较为疏远，儿时普遍近于现在，儿时同居的状况仍有发生。互动频率总体一般，空间距离越近的互动频率越高；互动方式新添了线上互动，并在逐渐成为主流方式；85-90 段人的互动内容多为家庭生活、育儿状况、父母身体情况，95-00 段人的互动内容多为学业、学校生活、情感状况。亲密程度总体较亲密，年龄差距小、共同生活经历丰富的亲密程度更高，且更不容易受空间距离的影响。互助（经济、生活琐事）意愿总体呈现出方向性，表现出“不愿求助、愿意帮助”的意向趋势，且受到年龄段的影响，更年轻的独生子女更会

体现这种趋势，反映出亲属互助纽带逐渐衰弱，但帮助的义务仍然存在；重病求助意愿总体较高。

4.2 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类型与功能

4.2.1 亲属交往类型

本文将采用杨中芳的“人际关系类型”这一研究框架，对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类型进行划分。杨中芳在她关于人际关系与人际情感的研究中（1999）改进了黄光国的理论模式，在黄光国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性”成分上增添了两个维度——“应有”和“真有”，并据此将黄的“情感”划分为“应有之情”（义务的、规范的情感，与“礼”相对应）和“真有之情”（真正的、自发的情感，与“情”相对应）。然后根据两个维度的高低划分出四种人际关系类型（如前文图1）。

本文试图利用该分析框架探究，在独生子女与其同辈亲属的交往中，独生子女认为其中的“应有”（义务性）成分如何？“真有”（情感性）成分如何？同辈亲属与自己的关系更接近于上述表格中四种的哪种类型？是高应有、高真有的“自己人”（关系紧密、如同“家人”一般），还是高应有、低真有的出于亲戚义务这种人情的“身份性自己人”，还是高真有、低应有的像朋友般的“交往性自己人”，亦或是低真有、低应有的“外人”？

义务 情感	情感	
	高真有	低真有
高应有	自己人： YN、Lx、CY、Yinky、 Dan、Wen	身份性“自己人”： Luo
低应有	交往性“自己人”： Eric	外人

图2 访谈对象与同辈亲属的交往类型

如上图（图2）所示，有6位（YN、Lx、CY、Yinky、Dan、Wen）访谈对象都表示他们认为自己的同辈亲属是“高真有、高应有”的“自己人”。在谈及“高真有”之情时，他们往往会提及“因为小时候和他/她一起长大，所以感情比较深”；在谈及“高应有”之情时，他们往往会说“因为我们是亲戚，亲戚之间总有些应该尽的义务。他/她是我的表亲所以我应该帮助他/她，彼此照顾彼此”。

当进一步分析这6位被访人的特征时，我们可以看到，YN和他表姐的关系是最典型的“自己

人”。YN 是农村户口，他的同辈亲属关系更带有“传统”的色彩。他认为亲属之间的纽带是牢固的，亲戚之间应该是热络的，也是彼此照应的。如果和一个人不怎么热络，那他应该被划分为“外人”、“陌生人”。

我有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我感觉你们上海人的亲戚关系好像都很冷淡的……我们很注重家庭观念，尤其这种逢年过节，家庭拜年、聚会这种还是很频繁的。……要是姐姐来上海玩，**肯定是直接让她们到我家里来住这种**，我甚至会直接跟他们说，如果什么时候来旅游，或者玩一玩转一转，就直接住我这儿，我就带他们出去吃好吃的这种。（YN）

同时，他和表姐儿时一同长大的成长经历也让他们关系中的“情感”部分更加坚固，“基本上我跟姐姐相当于是那种，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感觉”，表姐就相当于是一个完全的“家人”。

其他 5 位的纯“自己人”关系类型虽然没有 YN 那么典型，他们也都不是农村户口（也就没有那么“传统”），但也展现出了不少与 YN 相似的特征。比如 Yinky 的父母是农村户口，从小和表姐住的也就隔几栋房子，由于表姐儿时父母离异（表姐随母亲），Yinky 说自己的母亲（双方的母亲是亲姐妹关系）完全是“把表姐当作另一个女儿养的”，所以“从小感情很深”。而自己的父母和他们的同辈亲戚的互动又是十分热络的，因此觉得自己“自然而然和表姐也会是这种（互动）模式”。CY 的表妹“自从襁褓之中就和我住在一个小区了”，表妹上学之后每晚来自己家吃晚饭，直到自己去外省上了大学才没有这样“几乎每天都见面”，他和表妹的感情也是十分深厚的。同时，自己的妈妈和阿姨（妈妈的亲妹妹）由于也住在同一小区，经常互相往来，交流各种生活、工作上的事宜，CY 觉得她们的互动也是十分频繁的，关系也很紧密，而“自己和表妹也是这样，和她们一样”。

在其他 4 位被访人中，Luo 和 Pei 较相近，Luo 认为她和表哥的关系是“高义务、低真有”，而 Pei 认为她和表哥的关系是“高义务、一般真有”。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和同辈亲属的年龄差距较大，共同生活经历也不丰富，这导致她们觉得自己与表哥好像不怎么亲近，也就是“低/一般真有”。但她们的父母和同辈亲属，包括家族里的其他亲属之间互动比较频繁，“我爸和我姑姑小时候一起分担家务，关系很深……他们现在也彼此搀扶”（Pei），甚至父母会要求她们加入这种亲属间热络、互助的局势，“我妈有提起过让我和我一个表姐多走动，也有提过如果表哥家以后经济状况不好，让我去多照应一下他的孩子”（Luo），这使得她们对同辈表亲的“义务”成分比较高。

而 Eric 则是与她们相反的“低义务、高真有”，“我对我表妹是纯情感的，她是很重要的人。对于这种人就是有一种自信你知道伐，就是觉得她有一种本性，不会轻易改变的。……我以前每年寒暑假都会去她们家住上半个月一个月的，我觉得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互相促成了双方的性格。”而同

时他的母亲与阿姨（母亲的亲妹妹）由于常住地跨省（一个上海、一个江苏常州），互动频率不高，只是在寒暑假、过年时相见，母亲与阿姨较少的互动可能造就了他的“低义务”。

另一位被访人 ZQ 则认为他在两个维度上均“一般”，不高也不低。

年龄段对义务的高低有影响，85-90 段（Luo、Lx、Yinky、Dan）均具有高义务，而 95-00 段的义务性有所降低。

此外，我还特意询问了“是否存在长辈要求你去和某位同辈亲属多交流/做人情/帮忙的情况？”，发现在义务性高的个体身上一般都发生过这种情况，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家庭/家族内部的传统亲属观念是牢固的。

我妈有提起过让我和我一个表姐多走动，也有提过如果表哥家以后经济状况不好，让我去多照应一下他的孩子。（Luo）

有公公婆婆让我们和表哥表姐多走动一下。（Yinky）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得出，独生子女更多地将自己的同辈亲属当作是“高应有、高真有”的“自己人”、“家人”，而当作“交往性自己人”（朋友）和“身份性自己人”（远房亲戚）的较少，被访人中没有人将同辈亲属当作“外人”。此外，对于影响“应有”、“真有”高低的因素，我们或许可以推断：与同辈亲属的共同生活经历的丰富与否，与“真有”的高低有很大的关联；家庭/家族内上一辈人（尤其是父母）与他们的同辈亲属（包括亲兄弟姐妹、同辈表亲）的关系紧密与否，以及家族/家庭内传统的亲属观念牢固与否，与“应有”的高低有很大关联。此外，年龄段对“应有”的高低有影响，年轻一代（90-00 段）的独生子女情感成分中的“应有”性有所降低。

4.2.2 亲属交往功能

根据访谈资料，亲属交往的功能主要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情感需求的满足，一种是实用需求的满足。情感上，多为陪伴、依托、安全感的给予。实用上，多为互惠互助、互相帮忙。

情感：

在面对生活的烦恼，或者说这种事业的不顺时，有一个可以让你**倾诉的地方**……跟你带来一定的**安全感**。（Lx）

一个可以向他**抒发自己的情绪**，然后**跟自己沟通**的人，就是一个**聊天对象**。同时也是**一个玩伴**，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精彩，如果缺少了他生活会暗淡许多。（Dan）

实用：

互助上有一些需求……像是**借钱**这种，因为有亲戚这层关系在，他可能会愿意借给我。
因为你借钱的时候对方总要考虑你是不是会还钱，如果是朋友的话他可能对你没有一个特别的保证，亲戚的话他知道我还钱的可能性比较大。（Luo）

相互扶持……有义务去**照顾彼此**。（Yinky）

如图 3 所示，在 10 位被访人中，有 7 人（YN、Lx、CY、Yinky、Pei、Dan、Wen）认为他们与同辈亲属的交往既具备情感上的功能，又具备实用上的功能。有 2 人（ZQ、Eric）认为他们的交往只具备纯情感的功能。有 1 人（Luo）认为在交往中实用功能占了绝大部分。

情感+实用： YN、Lx、CY、Yinky、 Pei、Dan、Wen	实用： Luo
情感： ZQ、Eric	无

图 3 访谈对象与同辈亲属交往的功能

这与上述四种亲属交往类型基本对应。高义务、高真有的“自己人”关系兼具情感和实用两种功能；低义务、高真有的“交往性自己人”关系只具备纯情感性功能；高义务、低真有的“身份性自己人”关系里实用功能占比极大。

同时，也与交往状况中的“亲密程度”和“互助意愿”两个维度具有一定的对应性。亲密程度高的，交往一般具有情感性功能；互助意愿高的，交往一般具有实用性功能。

4.3 社会变迁下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维持交往的意愿

4.3.1 独生子女与父母辈同辈亲属交往的比较

10 位访谈对象的父母都有亲生的兄弟姐妹。对于父母辈的同辈亲属交往状况，访谈对象认为他们在互动频率、亲密程度、互助频率上基本都高于自己和自己的同辈表亲，尤其是在互动频率和互助频率这两项上。

他们**互动频率很高**的，因为住的比较近，基本是每天一次。我爸爸和他兄弟姐妹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的，妈妈那边有一个姐姐也基本每天会见上一面，因为她车子停在我妈家那边，然后每天会帮我妈买菜什么的。还有几个姐姐，互动少一点，但是也很亲密，会经常打电话。（Yinky）

我妈妈和堂弟住的比较近的时候，会互相串门，后来住的远了，关系稍微远一点，但也会经常在一起打打麻将什么的。……他们会互相借钱的。（ZQ）

他们之间挺亲密的……互相之间借过钱的，但我感觉他们那种**借钱**都没什么的，**都不怎么当一回事的**，反正知道你也会还的。……鉴于我们家这个“优良的借钱传统”，我想我跟我表哥借钱的时候他是愿意的。（Luo）

在交往类型上，10位访谈对象都表示他们是纯粹的高义务、高真有的“自己人”型。

在交往功能上，首先反映的是实用性的功能更为突出，父母辈的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会更多，甚至是“一路这样互相扶持走过来的”（Wen），其次是觉得他们与亲兄弟姐妹的情感比自己与同辈亲属的更亲密。

在父母辈与其同辈亲属的互动中，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他们的互动是在一种传统下的“惯例”中进行的。这种互动是习以为常的、十分固定的，在传统的框架中，人们不需要去主动维系什么就可以保持稳定的关系结构。

我们很注重家庭观念，尤其这种逢年过节，家庭拜年、聚会这种还是很频繁的。这种聚会甚至都不用组织，大年初一到谁家去拜年，都是**很久以前就固定下来的**。每到了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去了**，不需要有人去组织，大家已经**形成默契**了。（YN）

我们会特意约，他们**“特意约”的情况很少**，只有过年过节为了凑大家的时间才会特意约。他们可能就吃完饭，散个步，就去串了一下门。（Yinky）

传统对独生子女父母辈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有客观因素使得传统破裂，他们会想尽办法使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续：“我父母和他们的兄弟姐妹都已经离开我们原来的村子，去外面各自打拼了……他们在不同的省市……他们会有**定期联系**，就会各个方面都考虑到然后想办法把大家叫在一起。”（Lx）

而对于 80 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来说，“传统”对他们的作用逐渐式微，不再具有如他们父母辈那么强的强制性了。在这种情况下，亲属关系的结构变得较为松散，不再那么紧密。

像我们就**比较随性**，我们这一辈的话可能就是想到了就联系，没有联系好像也**觉得不是很要紧的事情**。（Lx）

本文想继续探究，在这种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下，独生子女具体会选择以怎样的方式处理他们与同辈亲属之间的关系呢？是主动维系，还是随性往来？亦或是别的形式？他们选择的关系处理方式又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呢？

4.3.2 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维持交往的意愿

以往有学者提出假设，未来独生子女与他们的同辈亲属之间的往来会越来越少，联系也会越来越弱（风笑天，2020），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经过对 10 位独生子女对象访谈内容的分析后，如表 6 所示，我发现，有 6 位（YN、Lx、CY、Yinky、Dan、Wen），即超过半数的访谈对象表示他们以后会主动维持起和同辈亲属的关系。他们愿意主动联络自己的堂表亲，主动承担起组织和堂表亲的聚会的“任务”。我把这类归为“主动型”交往。

如果以后（老了）有空闲时间了，我觉得会**更惦记**这种亲属关系，或者是更喜欢去热闹一点。因为像很多我觉得退休了的人，就会很喜欢组织聚会什么的这样……（你会**主动组织**吗？）会的。（Yinky）

我希望自己以后能**更主动**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我都不是特别主动。（CY）

就是说我们会**主动去联系对方**，因为其实排除朋友关系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亲情的联系**。我可能会有时候说，我弟弟最近好久没联系我了，我要关心一下他这种刻意的。然后有可能我不联系我弟了，然后我弟就（会来问我）说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呀，或者说最近很忙。大家就会这样去**主动地聊一聊**。……（你以后过年过节会**主动邀请**弟弟家来你们家吃饭吗？）会的呀。（Dan）

我跟我表妹**应该会**（主动联络）。……应该就是过年回家会沟通，然后可能也许以后**微信上会增加互动**，增加互动的目的是，我得提醒她就是生活中还有这么个人。然后就是如果以后去成都玩的话会找她。……（以后等爸妈都老了，你会**主动组织**比如过年过节聚会

这种事吗？）**应该会**，嗯，应该会的。（Wen）

1 位被访人（Luo）表示，没事情不会主动联系，有事情会寻求堂表亲的帮忙，同时同辈亲属之间应该尽互助的义务。我把这类归为“义务型”交往。

主动定期联络没太大必要。他没成家的时候你可能跟他互动多一些，但成了家之后就觉得不能去打扰人家。……**不需要硬制造**出一种我们在热络的感觉，**有事情就说**，没事情没必要主动去联络的。你工作中可能需要和人联络，维持一下感情，**亲属之间**，说白了就**不要整那些虚的**了，大家在群里聊聊就可以了，没必要私下聊聊这种的……亲属关系呢，它就像一个隐形的纽带一样，我们 80-90 代还是认可这个纽带的存在的，我们会因为有这根纽带的存在而**愿意尽一些亲属的义务**的。如果他来问我借钱，我也会愿意借给他，我们觉得亲人之间是需要互相帮助的，要比一般的朋友之间要给到更大的帮助，做出更大的付出，我们在意识上面是认同这个的。所以比如说，在我遇到风险或者说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我是觉得我这个表亲可能是**会比我的朋友更加坚实的一个后盾**，我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我也可以当他的后盾，**我也愿意当他的后盾**，是这么一个情况。（Luo）

1 位被访人（Eric）与 Luo 完全相反，是“随缘型”。这种类型的交往维系风格是：以后和同辈亲属之间随缘联系，就像和朋友一般，如果有契机亲近就亲近，没有契机关系就随之消散，并且不认为亲属间需要尽义务。

（表妹）比较接近朋友吧……对于这种人就是有一种自信你知道伐，就是觉得她有一种本性，不会轻易改变的。（这种自信的来源是哪里？）只能说纯玄学，就是感觉**有种相似性，一种共性**，不会改变，人的本性吧……就对我来讲，**从来没有什么亲属一定要尽什么义务**这样子的概念……如果我会维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出于我个人的好奇心**，想了解一下我的家族成员到底是在过什么日子，才会去见他们。（Eric）

2 位被访人（ZQ、Pei）表示希望能继续保持和堂表亲的交往，但是自己可能不是主动的那一方，更寄托于对方主动来进行联络。我把这类归为“被动型”交往。

我觉得以后老了会想要这种聚会的，就这种一窝子人围在一起。等你老了或者快退休

的时候，你还是希望家里有些烟火气的。（你会主动去组织这种聚会吗？）我？我的话……我更希望他们主动一点。（ZQ）

我不会主动和我哥联络，因为我知道我不联络，咱们的关系也在那边，坚不可破。因为只要我爸妈，和我爸的姐姐、姐夫一天在这个世上，那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是坚不可破的。

（那假设说如果以后他们不在了呢？）不在了，那我觉得我和我哥虽然不能说是相依为命，但我们彼此知道都是最亲近的人了。（那你会主动和他联络吗？）如果他们不在了，那联络的人只能是我了，我肯定是会的。（你会更希望他主动和你联络，还是你去和他联络？）他跟我联络。不然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一厢情愿的，就不知道他在不在乎这段关系，可能我在我哥心目中也并没有那么重要。（Pei）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Pei 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些。她认为父母在世时她和表哥的交往具有高义务性，只要父母和表哥的父母在世，他们的关系就是“牢不可破”的。如果父母不在世了，她想将这种义务的关系维持下去（“只能是我，肯定会的”），但当追问哪方主动时，Pei 又希望表哥能更主动些。也就是说，父母在世时 Pei 是“义务型”，假设父母离世 Pei 是“被动型”。

“被动型”和“主动型”的差别是缺少了一定的“真有”成分。从 ZQ 和 Pei 的话——“想要一窝子人围在一起”、“希望家里有烟火气”、“只能是我”中可以看出，这些“想要”、“只能”都是传统留下的典范。他们过去受到传统典范的浸染，认为亲属以后“应该”是要和以前一样，聚在一起过日子、互相联系的，但又因为自己和同辈亲属之间的“真有之情”连结没那么强，所以不愿意主动去联系他们，只能徒留形式，转化成“被动”。

还有一种交往意愿的潜在类型，在此次的 10 位被访人中没有特别显现，但有一位被访人有此倾向。

（您以后有没有主动和表妹维持关系的意愿？）会有会有。（您觉得是怎样一种形式呢？比如说像父母辈那样定期组织，包括家庭聚会、祭祖，还是说比较随便的那种？）介于二者之间，因为现在像以前那样，客观上也做不到。都有工作，例如清明节放三天假，也没有办法赶回老家去祭祖再赶回来。但是就是说客观上做不到，主观上还是有这种愿望的。（Lx）

在这里，他虽然主观上“有愿望”，但他身上的义务系统不再能够支撑他完成这种愿望，传统的力量由于现代化的进程有所削减。我把这种潜在的交往意愿类型归为“摇摆型”。“摇摆型”相比于

“主动型”，其义务性有所降低。

综上，有 6 位独生子女被访人与同辈亲属的交往意愿是“主动型”，2 位“被动型”，1 位“义务型”，1 位“随缘型”（如表 6 所示）。

除了 ZQ、Pei 两人之外，其余被访人的交往意愿类型均可以与他们的交往类型相对应（如图 4 所示）。“主动型”交往意愿对应“高义务、高真有”的“自己人”类型；“义务型”交往意愿对应“高义务、低真有”的“身份性自己人”类型；“随缘型”交往意愿对应“低义务、高真有”的“交往性自己人”类型。“真有性”的降低可能会导致交往意愿从“主动型”变为“被动型”（ZQ、Pei）。“义务性”的降低可能会导致交往意愿从“主动型”变为“摇摆型”（潜在类型）。

表 6 访谈对象与同辈亲属维持交往的意愿

	ZQ	Eric	YN	Luo	Lx	CY	Yinky	Pei	Dan	Wen
维持意愿类型	被动型	随缘型	主动型	义务型	主动型 (摇摆型)	主动型	主动型	义务型； 被动型	主动型	主动型
关系类型	一般义务 一般真有	低义务 高真有	高义务 高真有	高义务 低真有	高义务 高真有	高义务 高真有	高义务 高真有	高义务 一般真有	高义务 高真有	高义务 高真有

情感		高真有	低真有
义务	高应有	“自己人”——主动型： YN、Lx、CY、Yinky、 Dan、Wen 潜在——摇摆型	身份性“自己人”——义务型： Luo Pei——被动型 ZQ——被动型
	低应有	交往性“自己人”——随缘型： Eric	外人

图 4 维持意愿类型与交往类型对应图

我们或许可以说，对于一个同辈亲属的“角色定位”对维持交往意愿有很大影响。如果一个堂表亲被看作是义务和情感“双高”的纯“自己人”，那作为独生子女的被访人就很有可能采取主动联络维持关系的方式。这样纯“自己人”的角色的位置相较于朋友来说更加固定，即多了一层义务的关系。更明确地说，朋友在一个人的关系圈中的位置会随着与主体之间亲密程度的变化而变化，亲

密的时候在圈子的中心或者靠近中心的位置，疏离了就会离圈子的中心越来越远；但同辈亲属的位置相对更加固定，不会轻易变化，他们可能始终在某个位置的周围徘徊。而同时，这种角色相对于传统下富有强制特征的义务又多了一层情感上的连结，这就使得同辈亲属比起远房亲戚更具备交往性，是可以在情感上进行亲密的对象。“高义务、高真有”的“自己人”型的同辈表亲是最会让人（独生子女）有愿意将这种亲属关系推进、维系下去的。而其他的类型，无论是缺少了义务的“随缘型”，还是缺少了情感的“义务型”，亦或是义务有所降低的“摇摆型”和情感都有所降低的“被动型”，都不能使亲属关系以最完整的形式得以延续。

结合上文对亲属交往功能的分析，主动维持和“自己人”的关系，可以在情感和工具性帮助两方面给予未来年迈的独生子女社会支持；“义务型”可以在工具性的相互帮助方面得到支持；“被动型”、“摇摆型”的维持方式不确定性高，不能保证未来给予支持；如朋友一般的“随缘型”维系方式可能会随着机会结构的减弱变得越来越缥缈，其在人际圈中的位置越来越远离中心，也就几乎很难在未来提供支持了。年龄段对关系维持意愿类型有影响，85-90段的被访人（共4位）中有3位“主动型”、1位“义务型”，而95-00段（共6位）中只有3位是“主动型”，意味着80-90段独生子女得到来自同辈亲属社会支持的概率比90-00段高，后者在未来更需要被重点关注。90-00段的独生子女自身也表达出对日后亲属关系维持的担忧。

我现在还不懂，怎么和他们继续保持联系，如果他们把我都忘了，我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交流了。（Pei-被动型）

就等我长大以后，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关系，我跟我爸那边的亲戚其实也没有很熟络……如果以后我爸妈不带着我了，我自己要怎么去走动这些关系，我，我可能会放弃（笑）……我跟我妹属于是情感联系，大家一起过年会有回家的感觉，然后我爸那边的话，我跟我外甥关系也还行，可能过年拜个年什么的，但是跟其他亲戚，我就有点疑惑，就是不知道怎么接过这根接力棒了。（Wen-主动型）

可以看出，在他们身上，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使他们陷入了矛盾的境地，放弃还是维持亲属关系处于“不上不下”、摇摆不定的状态。

5 总结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交往开展研究，分别探讨了他们与亲属交往的状况、类型与功

能、变迁下维持交往的意愿，对当代社会这个特殊群体的亲属关系进行了比较完整的描绘，并对他们未来亲属关系的社会支持能力做了预测。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一）独生子女的同辈亲属关系虽然没有像经典现代化理论所说的那样趋于消失，但也不是“相当活跃”（唐灿、陈午晴，2012），而是保持着一定的紧密性，相比过去则呈现出略微“下滑”的趋势。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在空间距离上较为疏远、在互动频率上一般、在经济和其他生活琐事的求助意向较低，但亲密程度较高、重病求助意向较高、经济和生活上给予帮助的意向较高。对于这个比较“古怪”的局面，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空间距离较远、互动频率较低，但却保持着较高的亲密程度，这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亲和性”的高低似乎与“机会结构”没有太大的关联。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对影响亲密程度的因素做出了补充，得出共同生活经历（尤其是儿时）的多少会影响亲密程度。沈奕斐（2010）在她的文中也提及，独生子女父母试图主动建构儿女的亲属关系，其方式就是让孩子寒暑假去堂表亲家里住上一段日子以培养感情。这种方式与上述结论不谋而合。其次，独生子女在互助上呈现“不愿求助、愿意帮助”的意向趋势，这反映出亲属的互助纽带逐渐衰弱，但“困境帮助”的义务仍然存在，亲属义务从“主动提携”变为“困境帮助”。然而这与以往研究的结论有所出入。唐灿、陈午晴（2012）在调查后得到，城市居民的互惠互助意向都非常活跃，且年龄组别越低，对各类亲属求助的意向也就越高。但独生子女群体似乎不是如此。独生子女群体中，年龄段越低，越呈现出对同辈亲属“不愿求助”的趋势。对于研究结果呈现差别的原因，其一可能是唐灿等人的研究统计了所有的亲属类别，而本研究只涉及同辈亲属；其二可能是求助意向确实在独生子女群体身上降低了，且年龄段越低意向也越低，反映出亲属网络对独生子女工具性社会支持的减弱。后续研究如果加入对独生子女其他亲属（包括父母、祖父母、其他长辈类亲属等）的探讨，或许可以得到更完整的解释。

（二）根据杨中芳的人际关系四种类型，探讨独生子女更多将同辈亲属当作“自己人”、“家人”，还是“朋友”或“远亲”或“外人”。结果得到，同辈亲属被更多地当作是高应有、高真有的“自己人”，少部分被当作“交往性自己人”（朋友）或“身份性自己人”（远亲），没有被当作“外人”的。年龄段低的独生子女的“应有”成分有所降低。此外，通过深访，对影响关系类型的两个维度“真有”、“应有”的因素做了总结：与同辈亲属共同生活经历的丰富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真有”；家庭内传统亲属关系结构（包括长辈的亲属关系、家族的传统亲属观念）的稳固性，很大程度上影响“应有”。对于同辈亲属关系的功能，大部分独生子女认为兼具情感和实用功能两者，少部分认为只有情感或实用。关系功能与关系类型高度对应。这个结果可以对前文亲属关系“差序格局”确定原则的改变（见前述，杨善华、侯红蕊，1999；沈奕斐，2010）作更明确的补充：高应有、高真有（同时具备情感和实用功能）的“自己人”位于“圈子”的中心，高应有、低真有（只有实用功能）的

“身份性自己人”以及低应有、高真有（只有情感功能）的“交往性自己人”均次之。

（三）以往研究大多从“互动频率”、“互助倾向”等客观视角对亲属关系纽带的强弱进行分析，本文试图从个体视角出发，探索亲属纽带的维系与解离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机制，个体是如何判断是否与一位亲属继续维持关系、保持互动往来的。在社会变迁的情境下，独生子女认为自己相较于父母辈，与同辈亲属的互动频率、亲密度、互助频率均有所降低，且父母辈的亲属关系大多处于稳定的传统“惯例”结构中，而传统在自己身上的作用降低。在此情境下，对于与同辈亲属的关系维持意愿，超过半数的独生子女被访人愿意主动构建自己与同辈亲属的关系，但年龄段低的独生子女主动的意愿越低。对于维持意愿的类型，本文概括出了以下五种潜在类型：主动型、义务型、随缘型、被动型、摇摆型。维持意愿类型与交往类型较好地对应，也就是说，同辈亲属在独生子女人交际圈中的位置，对其是否愿意继续交往有影响。高真有、高应有的“自己人”型是最愿意主动保持交往的，而较高的“真有”水平来自于（儿时）与同辈亲属共同生活经历的多寡，较高的“应有”水平来自于家庭/家族中传统亲属关系结构的牢固性。与同辈亲属关系的良好维持有助于独生子女未来社会支持的获取，而较低年龄段（90-00 段）的独生子女维持交往的意愿降低，推测他们日后获得来自亲属网络社会支持的概率降低，因此需要重点关注此类人群年迈后的社会资源获取与心理健康状况。

如果说在过去（近十年前）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保持的是一种“疏而不离”、自主又连结的“和谐”亲属关系局面，那么当下年轻一代（尤其是 90-00 段）的独生子女群体则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体会到了维持亲属关系的困惑与矛盾的局面。传统的力量已经不再强大，不再能给他们提供如何维持关系的“规范”，他们在父母和长辈身上所目睹的关系维系形式由于种种原因不再能够自己身上延续。这时，对于如何维持亲属关系的“选择权”似乎交到了他们自己手中，这就使他们产生了“被动”、“摇摆”的局面。相比于过去人们在现代化来临时可以“摆脱传统强大的亲属责任和义务”，自主选择亲属交往对象，各取所需，独生子女与同辈亲属的关系维持景象就好比“悬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传统的式微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疏离，而对亲情与陪伴的渴望和对社会经济环境尚不能满足的部分工具性互助需求（客观上存在、主观上独生子女选择求助父母或自己解决）仍然存在。独生子女亲属关系的“矛盾”局面值得被关注。

参考文献

- [1] Talcott Parsons. 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Contemporary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3, 45(1).
- [2] 杰克·古迪:《序言》, 马尔蒂娜·雪珈兰:《工业革命:从普罗大众到布尔乔亚》, 载于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三); 袁树仁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 [3] 沈奕斐. 个体化与家庭结构关系的重构[D]. 复旦大学, 2010.
- [4] 唐灿, 陈午晴. 中国城市家庭的亲属关系——基于五城市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调查[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02): 92-103.
- [5] 杨善华. 关注家庭日常生活中的“恒常”——一个家庭制度变迁的视角[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21, 33(02): 16-21.
- [6] 陆学艺. 21 世纪中国的社会结构——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J]. 社会学研究, 1995(02): 3-11.
- [7] 王跃生.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 2006(01): 96-108+207.
- [8] 徐安琪. 城市家庭社会网络的现状和变迁[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5(02): 77-85.
- [9] 杨善华, 侯红蕊. 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J]. 宁夏社会科学, 1999(06): 51-58.
- [10] 风笑天. “后独生子女时代”的独生子女问题[J]. 浙江学刊, 2020(05): 64-73.
- [11] 王跃生. 个体家庭、网络家庭和亲属圈家庭分析——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J]. 开放时代, 2010(04): 83-99.
- [12] 王跃生. 中国当代家庭关系的变迁: 形式、内容及功能[J]. 人民论坛, 2013(23): 6-10.
- [13] 杨善华. 中国当代城市家庭变迁与家庭凝聚力[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8(02): 150-158.
- [14] Merrill Silverstein, Vern L. Bengtson.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in American Famil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 103(2).
- [15] 曾旭晖, 李奕丰. 变迁与延续: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类型学研究[J]. 社会, 2020, 40(05): 190-212.
- [16] 杨中芳. 人际关系与人际情感的构念化[J]. 本土心理学研究, 1999(12): 105-179.
- [17] 沈毅. 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型及相关挑战——从“差序格局”看关系的分类及其要素[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2006(01): 255-277.